

反腐败与地区创业：效应与影响机制^{*}

黄亮雄¹ 孙湘湘² 王贤彬³



- (1.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6;
3.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内容提要: 鼓励创业和反腐倡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紧抓的两项任务, 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工作。反腐倡廉是否对创业具有促进效应, 成为亟需回答的理论问题。本文以副省级官员落马表征反腐败冲击, 基于 2000—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考察了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本文发现, 反腐败能显著促进地区创业活动, 增加创业数量。这一结果是稳健的, 采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考虑安慰剂检验等, 结果依然存在。究其机制, 反腐败通过显著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信心三大影响渠道促进创业。同时, 十八大后反腐败促进地区创业活动效应大于十八大前。本文的发现意味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 有望成为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机制保障。

关键词: 反腐败 高官落马 创业 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 F12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19)09—0005—15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同时, 报告规划了中国未来发展蓝图, 指引着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鼓励大众创业, 正是新阶段中国提升市场活力, 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近年来, 推动大众创业成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 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 不遗余力地鼓励创业。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系列研究表明, 营商环境对创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①。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促进大众创业, 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地方政府与官员的行为与表现, 深刻影响着营商环境的建设; 中央对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激励与监督, 也将作用于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更加雷厉风行地推行反腐倡廉工作, “打虎拍蝇猎狐”的高压反腐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反腐倡廉既在政治领域产生深刻影响, 也在经济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重大现实背景之下, 研究反腐败具有怎样的经济效应以及其背后的

收稿日期: 2018-09-06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区域互动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7140306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行政审批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理论机制、实证识别与政策设计”(7177303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研究”(2018ZDXM07)。

作者简介: 黄亮雄, 男,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是产业经济学, 电子邮箱: chickyliang@126.com; 孙湘湘,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是产业经济学, 电子邮箱: lookxiang@126.com; 王贤彬, 男,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 电子邮箱: wangxianbin123@163.com。

^①《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Report)是世界银行年度旗舰报告, 应用量化的指标分析约全球 190 个经济体的商业监管法规和财产保护, 旨在衡量监管法规是否有助于推动或是会限制商业活动。

影响机理,就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王贤彬等,2017)^[1]。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高官落马被看作反腐斗争的重要成果^①,反映着地区反腐败的程度与所做的努力(王贤彬等,2016^[2];王贤彬和王露瑶,2016^[3]),可以改变地区政治清廉度,进而改善地区营商环境。本文基于高官被查落马的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影响效应,分析其重要影响机制,以希望为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启示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思路,本文采用2000—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以副省部级及以上政府官员被调查的事件表征的反腐败对地区创业产生的影响效应。我们发现,高官落马显著提高地区创业数量。该结果是稳健的,在更换了度量创业的指标、更换了估计方法以及考虑了潜在共同因素之后,仍然稳健。这种关系背后的逻辑机制是,本地高级官员被调查和处理,产生了一种震慑效应,提升了本地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促使地方政府部门与官员更加谨慎行事,更加按照规则制度履行工作职责,积极提升行政效率和服务效能,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和相应的腐败掠夺行为。对市场主体而言,高官落马显示了政治清廉度的提升,营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导向,增强了市场发展的信心,强化了创业的动力。

与以往的文献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与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传统研究关注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借助高官落马,强调了高级官员对地方微观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是对现有官员理论的补充;同时发现高官落马产生显著影响,也在理论上表明了重大政治事件能够产生重要的信息价值,影响官员和企业家等政治和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是对信息经济理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有效体现。第二,与以往关注反腐败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不同,本文聚焦于创业这一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行为,研究了反腐败对创业的效应,拓展和深化了反腐败经济效应的研究脉络。第三,本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反腐败影响创业的中介效应,致力于理解创业的内在决定机制。本文从政府(官员)和市场主体层面,检验了反腐败通过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信心作用于地区创业。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1. 反腐败的度量文献

本文重点研究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冲击效应,对反腐败问题的研究首先要解决如何科学合理度量反腐败。现有关于反腐败的度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采用腐败案件立案数或腐败案件查处人数来度量反腐败力度(高远,2010^[4];王健忠和高明华,2017^[5])。此类方法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检察年鉴》。类似地,吴一平和朱江南(2012)^[6]利用县审计局的审计人员数量、审计项目数及审计查处的违纪金额来反映县级反腐败力度^②。杨其静和蔡正喆(2016)^[7]采用各省党委的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立案数与举报数来表征反腐力度。诚然,诸如《中国检察年鉴》报告的腐败渎职立案数和涉案人员数,是较为客观的指标。但是,这一指标也存在局限性。首先,腐败渎职立案数和涉案人员数较多,可能是因为腐败程度较深,而不是反腐力度较大。换言之,该指标可能反映的是腐败程度(周黎安和陶婧,2009^[8];吴一平和芮萌,2010^[9])。其次,被查处的案件和人员,反映的是过去的情况,不能准确地反映当前情况。

采用高官落马数据度量地区反腐败程度是近年来常用的处理方法。例如,党力等(2015)^[10]、王贤彬等(2016)^[2]、王贤彬和王露瑶(2016)^[3]、王贤彬等(2017)^[1]采用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被贪腐调查的人数来衡量反腐败力度。聂辉华和王梦琦(2014)^[11]以2003—2013年中国352个厅级以

① 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成就述评[N]. 人民日报,2017-9-18.

② 这是不多见的能够具体到县级单位的审计和反腐指标,但时间连续性上难以保证。

上腐败官员是否被抓的虚拟变量来度量反腐败力度。与被查处的案件和人员相比,高官落马数据更能反映地区当前的反腐力度。一是相比于一般公职人员,厅级,甚至是副部级以上官员的人数较少,高官被查处,更能反映地区反腐的决心与力度。二是腐败往往呈现网状结构,高官处于该网状结构的中心。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及配置效率的损失,同时还对其他政府官员产生示范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加剧腐败态势,助长腐败现象的蔓延恶化。因此,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被调查较好地反映了地区反腐败的决心和反腐败的力度。因此,本文也采用高官落马数据度量反映腐败程度,关注的是特定级别的官员(副省部级及以上级别官员)的被查处事件。

2. 反腐败的影响效应文献

腐败与反腐败相伴而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少学者对反腐败的效应开展了研究。王贤彬和王露瑶(2016)^[3]、龙小宁和黄小勇(2016)^[12]、Qian和Wen(2015)^[13]认为,反腐败抑制了经济和投资增长。傅勇(2010)^[14]则关注到反腐败力度的增强,改善了基础教育的质量。高远(2010)^[4]指出,反腐败力度的增强优化了投资环境从而对FDI有正面推动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分析反腐败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王茂斌和孔东民(2016)^[15]认为,增强反腐败力度强化了高管激励机制。党力等(2015)^[10]发现反腐败政策实施使得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王健忠和高明华(2017)^[5]也发现反腐败增加了企业家寻租的成本,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在反腐败行动中,高官落马对广泛存在的腐败活动产生震慑和遏制作用,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但促进了高效率工业企业的投资活动,改善了投资资源的配置效率(王贤彬等,2017)^[1]。钟覃琳等(2016)^[16]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产生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反腐败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目前关注腐败或反腐败对地区创业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例如,贺建风和陈茜儒(2018)^[17]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分析腐败与创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余泳泽等(2018)^[18]采用跨国(地区),检验腐败监管(反腐败)对创业创新的影响。然而,前者采用贪腐渎职立案数来界定腐败程度,这就陷进了立案数到底是反映腐败还是反腐败的争论中(吴一平和芮萌,2010^[9];王贤彬等,2016^[2])。后者的腐败监管数据是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的腐败监管指数,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分析。

特别地,就高官落马或者反腐败的研究而言,不少论文只关注实证结果,在机制讨论上较为欠缺(党力等,2015^[10];王贤彬等,2016^[2];王贤彬等,2017^[1])。本文更强调高官落马影响地区创业效应的内在机制分析,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了反腐败通过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信心作用于地区创业。

3. 创业的宏观因素考察文献

本文采用地方政府与官员视角,分析反腐败对创业的影响,属于从宏观层面考察创业影响因素的范畴。传统文献关注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对创业的影响。例如,Djankov等(2005)^[19]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起到决定性作用。制度环境及报酬收益决定了企业家才能配置(Baumol,1990)^[20],制度的缺失使得企业家从事项目生产及研发的意愿极低,对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热情更高(Hodler,2009)^[21]。程俊杰(2016)^[22]研究也发现制度质量的提高和市场化程度的推进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领域的配置,促进企业家创业精神。同时,也有文献关注到地方政府或官员对地区创业的影响。例如,Estrin等(2013)^[23]认为政府管制是影响创业的主要因素。严格的政府管制提高了创业活动的成本,降低了个体的创业概率(陈刚,2015)^[25]。Dreher和Gassebner(2013)^[25]提出制度质量影响了政府管制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复杂的企业开设程序减少了企业进入的数量。张龙鹏等(2016)^[26]也发现政府行政审批的强度的提升降低了创业倾向和创业规模。本文也遵循该视角,但借助高官落马,强调了高级官员对地方微观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无疑是对现

有官员理论的补充。

4. 理论假说提出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出现了不同范围和程度的官员腐败违法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借手中的行政权力,通过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创业、投资、经营和交易等活动,获取部门乃至私人经济利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掠夺之手”。这种腐败活动降低了地方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效率,提高了企业的交易和发展成本,令潜在创业者对创业所可能承受的政府“掠夺”产生负面预期,丧失创业信心(La Porta,1999^[27];Pellegrin 和 Gerlaph,2004^[28];Vorley 和 Williams,2016^[29])。反之,腐败监管、反腐败以及高官落马能完善制度因素(赖敏等,2018)^[30],既能够改变政府组织的政治氛围和行政效率,也能够向市场传递政治清廉程度提升的良性信息。党力等(2015)^[10]指出,对于谋求政治关联的企业来说,反腐败增加了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的成本,有利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黄亮雄等(2018)^[31]则认为,反腐败对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大。

王贤彬等(2016)^[2]、王贤彬和王露瑶(2016)^[3]强调反腐败尤其是高官落马产生的震慑效应。反腐败对地方官员及政府行为产生震慑效应,促使地方官员按照规则制度履行工作职责,积极提升行政效率和服务效能,督促加强政府官员对投资活动审批的规范性,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和相应的腐败掠夺行为。对市场主体而言,高官落马显示了政治清廉度的提升,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了市场信心,强化了创业的动力。因此,本文提出核心理论假说:

H_0 : 高官落马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创业。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1.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反腐败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参考王贤彬和王露瑶(2016)^[3]、王贤彬等(2017)^[1]以及黄亮雄等(2018)^[31]模型,采用2000—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下计量回归模型:

$$Y_{it} = \beta_0 + \beta_1 anticor_{it} + X' \Gamma + \alph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代表省份, 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Y 反映地区创业活动,我们分别考察创业数量的增量(inc_amount)和创业数量的存量(sto_amount)。核心解释变量 $anticor$ 是各个地区反腐败力度。 X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Γ 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矩阵; α_i 和 γ_t 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由此,系数 β_1 的符号与大小衡量着反腐败对创业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具体为,若 β_1 显著大于0,则反腐败对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显著提高创业数量;若 β_1 显著小于0,则反腐败有碍于创业活动,显著降低创业数量;若 β_1 不显著,说明反腐败对创业活动没有显著影响。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创业企业数的增量(inc_amount)和创业企业数的存量(sto_amount)。由于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门槛较高,一般情况下,新成立的企业多为私营企业。参考Rui等(2008)^[32]、Li等(2012)^[33]、Chang和Zhang(2015)^[34]、明秀南(2016)^[35],本文采用当年私营企业户数和个体户数之和表示创业数量的存量,采用新增私营企业户数和新增个体户之和表示创业数量的增量,即利用当年年末值减去上年年末值^①。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2)反腐败($anticor$)。本文借鉴王贤彬等(2016)^[2]、黄亮雄等(2018)^[31]的研究,采用各地区

^① 这里增量单位为十万户,存量数据的单位均为百万户。事实上,考虑到退出市场企业数难以统计,存量数据更多地说明了存活下来的企业数量,而采用当年年末值减去上年年末值,则低估了创业的数量。如果考虑到退出市场企业的情况,本文的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效应将更大。

该年度立案调查的贪腐违纪案件所涉及的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人数来构建高官落马虚拟变量表征反腐败状况。也就是,如果某年某地区发生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关于这一数据,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落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力度。由于中央部委、央企系统及军队系统等高官落马事件无法分配到各个地区,因此,本文搜集的样本只包含了各个地区党政机关系统的腐败案件。第二,由于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属于执法部门,其实际的影响力远低于掌握实权的党务行政系统官员,因此,在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中剔除了司法官员落马数量,并在剔除司法官员后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进行赋值。第三,本文的研究是基于高官被查落马的准自然实验,而对高官落马采用虚拟变量的设定,更符合准自然实验的研究框架。

(3)其他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我们主要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以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 ($\ln pgdp$) 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 ($open$) 衡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以人均受教育水平 ($peredu$) 捕捉人力资本水平;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 GDP 的比值 ($indus$) 衡量产业结构。控制变量还包括人口 ($population$),以人口的对数值来衡量。我们还依据现有文献 (Fisman 和 Gatti, 2002^[36]; 范子英, 2013^[37]; 王贤彬等, 2017^[1]) 的惯常做法,采用各省区人民检察院每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案件数与公职人员数的比值来衡量地区腐败状况 ($corrp$),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各省份各年度统计年鉴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c_amount	0.9351	2.1027	-16.5530	11.723
sto_amount	1.3683	1.1938	0.0430	8.5834
$anticor$	0.2258	0.4185	0.0000	1.0000
$\ln pgdp$	9.9598	0.8170	7.9226	11.6801
$corrp$	27.9375	10.7602	2.6495	63.8461
$open$	0.3180	0.4013	0.0323	1.7659
$peredu$	8.2748	1.2605	2.9980	12.3890
$population$	8.0719	0.8651	5.5529	9.3055
$indus$	0.8733	0.0663	0.6400	0.9900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基本结果分析

1. 基本结果

采用式(1)的回归方程,表 2 报告了反腐败对创业数量增量和创业数量存量影响的基本结果。第(1)~(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企业数增量 (inc_amount),第(4)~(6)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企业数存量 (sto_amount)。在创业数量增量的考察中,第(1)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当年是否出现高官落马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 0.586,即发生高官落马事件,显著增加了地区创业的数量,换言之,反腐败显著促进地区创业。第(2)列在第(1)列基础上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高官落马的回归系数为 0.570,显著通过 1% 统计水平检验,即反腐败促进了创业数量的增加。从系数大小分析,高官落马,导致了当年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增加了 5.70 万户,约相当于当年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存量数的 4.17%。换言之,高官落马促进了新企业的创立,具有创业促进效应。第(3)列在第(2)列

的基础上增加了上一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L. anticor*)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当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0.546,上一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即当年反腐败事件对当年创业数量增加有显著促进效应,但上一年的反腐败事件对当年的创业数量没有显著效应。

同样地,在创业数量存量的考察中,第(4)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当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0.172,即高官落马显著提高了地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存量数据,换言之,反腐败显著促进地区创业存量数。第(5)列在第(4)列的基础上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高官落马的回归系数为0.125,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表明高官落马仍然促进创业,使当年私营企业户数和个体户数之和增加了12.5万户。第(6)列在第(5)列的基础上增加了上一年高官落马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当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0.129,显著为正,但上一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26,即当年反腐败事件对当年创业企业数量增加有显著促进效应,但上年的反腐败事件对当年的创业数量没有显著效应。因此,我们发现反腐败(高官落马)对创业数量增量和创业数量存量有促进作用,该效应仅在当期成立,滞后效应不显著。与王贤彬等(2016)^[2]、王贤彬和王露瑶(2016)^[3]强调的震慑效应一致,高官落马对创业产生的显著影响在短期成立,也表明重大政治事件能够产生重要的信息价值,是对信息经济理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有效体现。这也与理论假说一致。

表2 反腐败对创业数量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i>inc_amount</i>			<i>sto_amount</i>		
	(1)	(2)	(3)	(4)	(5)	(6)
<i>anticor</i>	0.586 *** (3.53)	0.570 *** (3.12)	0.546 *** (3.05)	0.172 *** (3.78)	0.125 *** (2.84)	0.129 ** (2.59)
<i>L. anticor</i>			-0.169 (-1.24)			0.026 (0.48)
<i>corrp</i>	-0.028 (-1.69)	-0.015 (-0.91)	-0.016 (-0.92)	0.005 (0.56)	0.001 (0.09)	0.001 (0.09)
<i>lnpgdp</i>	1.145 *** (4.34)	-1.453 (-1.04)	-1.371 (-0.98)	0.646 *** (4.83)	-0.372 *** (-0.48)	-0.384 (-0.49)
<i>peredu</i>	0.414 (1.48)	-0.330 (-0.94)	-0.331 (-0.94)	0.054 (0.58)	0.245 (1.56)	0.245 (1.57)
<i>indus</i>	6.741 * (1.84)	1.532 (0.28)	1.650 (0.30)	6.271 *** (3.14)	3.241 (1.12)	3.223 (1.11)
<i>open</i>	-1.286 (-1.27)	-1.645 (-1.59)	-1.626 (-1.56)	-1.022 (-1.34)	-0.865 (-1.00)	-0.868 (-1.00)
<i>population</i>	-5.920 *** (2.78)	-8.698 *** (-3.78)	-8.595 *** (3.75)	-1.296 (-1.11)	-2.202 (-1.61)	-2.218 (-1.60)
常数项	32.116 ** (2.08)	83.445 *** (2.97)	81.882 *** (2.93)	2.439 (0.28)	18.991 (1.20)	19.235 (1.19)
地区虚拟变量	Y	Y	Y	Y	Y	Y
时间虚拟变量	N	Y	Y	N	N	Y
R ²	0.3588	0.4052	0.4062	0.6028	0.6329	0.6330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R²为拟合优度,N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稳健性检验

表 2 指出反腐败既显著提高了创业数量,也显著提高了创业产量。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由表 3 ~ 表 4 呈现。

(1) 动态模型的系统 GMM 回归检验。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值,并采用系统 GMM 对模型进行估计。表 3 中的第 (1) ~ (4) 列显示了系统 GMM 的回归结果。第 (1) ~ (2)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数量增量 (*inc_amount*),无论添加其他控制变量与否,高管落马 (*anticor*) 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反腐败对创业数量增量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第 (3) ~ (4)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数量存量 (*sto_amount*),无论添加其他控制变量与否,高管落马 (*anticor*) 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反腐败对创业数量存量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由此,上述四列的结果与表 2 一致,体现了表 2 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 I : 更换回归方法

被解释变量	<i>inc_amount</i>		<i>sto_amount</i>	
	(1)	(2)	(3)	(4)
<i>anticor</i>	0.776 *** (3.76)	0.441 ** (2.24)	0.067 *** (3.14)	0.058 ** (3.14)
<i>L. inc_amount</i>	0.371 *** (6.12)	0.173 *** (3.13)		
<i>L. sto_amount</i>			1.143 *** (94.31)	0.973 *** (12.95)
常数项	0.630 *** (7.73)	-22.543 *** (-3.12)	-0.089 *** (-4.31)	-3.714 ** (-2.50)
其他控制变量	N	Y	N	Y
N	496	496	496	496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R² 为拟合优度,N 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安慰剂检验。表 2 和表 3 反映出反腐败与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这种正向关系也可能是某种无法观测和捕捉的因素引起的结果。换言之,反腐败和创业活动均同时受到某个因素影响,从而使得二者呈现正向关系,而不是因为反腐败与创业活动存在因果关系。为了排除上述可能,我们采用安慰剂检验。这里采用的安慰剂检验的思路是,如果反腐败和创业活动均受到某种没有捕捉到的因素的影响,使得二者成正向关系,那么该因素往往会同时作用于除创业活动外的某些经济后果;而在反腐败影响创业的逻辑下,这些经济后果往往不受反腐败的影响。本文提出如下逻辑,在反腐败影响创业活动的因果关系之下,反腐败应当不会显著影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设立和创业,而主要影响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设立和创业。原因在于,就创业而言,更多的是成立私营企业或个体户,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门槛较高。基于该思路,本文同时采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外资工业企业单位数及外商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作为被解释变量^①。如果反腐败 (*anticor*) 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反腐败与创业活动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佐证表 2 和表 3 的结论。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① 一般情况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外资工业企业单位数仅能反映工业情况,不能反映服务业等产业情况,但其数据年份较长,样本期可从 2000 年开始;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和外商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能反映全行业情况,但该数据自 2010 年起有统计,数据量较少。由此,本文同时呈现上述四个变量的结果,以显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其中,法人单位数缺失 2013 年数据,本文用 2012 年和 2014 年的均值来代替。

表 4 稳健性检验 II:安慰剂检验

被解释变量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单位数	国有控股企业法人 单位数	外资工业企业 单位数	外商控股企业法人 单位数
	(1)	(2)	(3)	(4)
<i>anticor</i>	-0.009 (-0.59)	0.012 (1.27)	0.010 (0.66)	0.004 (0.50)
常数项	3.041 (0.54)	0.118 (0.01)	2.888 (0.70)	-8.768 (-1.62)
其他控制变量	Y	Y	Y	Y
地区虚拟变量	Y	Y	Y	Y
时间虚拟变量	Y	Y	Y	Y
R ²	0.7822	0.5580	0.6402	0.3062
N	527	217	527	217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R² 为拟合优度,N 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4 中的第(1)~(2)列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无论是考虑样本期较长的工业企业状况,还是考虑样本期较短的企业法人单位数,高官落马虚拟变量(*anticor*)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同时,表 5 中的第(3)~(4)列被解释变量为外资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外商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结果显示,无论是考虑样本期较长的工业企业状况,还是考虑样本期较短的企业法人单位数,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反腐败与创业活动存在的正向关系,是由于受某个共同因素引起的逻辑并不成立,再次佐证反腐败显著促进创业活动,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这与表 2 的结论一致。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上文表 2~表 4 的实证结果显示,反腐败(高官落马)能够产生重要的信息价值,显著提高创业数量,本部分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也就是反腐败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到创业活动,或者说反腐败的信息价值如何提高创业数量。我们把作用渠道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政府与官员层面,二是市场主体创业者层面。这里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38]、隋广军等(2017)^[39]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重点考察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以及市场信心三大渠道,即把上述三变量作为创业数量的中介变量,其中,政府效率 and 市场化程度,反映的是政府与官员层面;市场信心反映的是市场主体层面。具体的检验方法如下:

$$med_{it} = \delta_0 + \delta_1 anticor_{it} + X' \Gamma + \alph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Y_{it} = \lambda_0 + \lambda_1 med_{it} + \lambda_2 anticor_{it} + X' \Gamma + \alph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med* 是本文关注的中介变量,即政府效率(*goveff*)、市场化程度(*mar*)以及市场信心(*conf*)三大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1)相同。式(2)和式(3)中,若系数 δ_1 和 λ_1 显著,则中介效应成立。

首先,观察政府效率的中介效应。政府是在转型经济体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通过税收、公共物品供给及监管等行为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开办一个企业,需要政府不同部门的签章审批,如果政府的行政效率高,能加快创业的产生,提高创业的意愿;如果政府的行政效率低,降低人们创业的意愿,阻碍了创业的产生。由此,政府的行政效率成为了影响企业家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反腐败一方面整治不作为的官员,另一方面震慑在位官员(王贤彬等,2016)^[2],从而反腐败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随着反腐败打击力度的加大,政府行政权力运行

更加规范,政府管制界限更加明确,政府部门间壁垒减少,政府公共品及服务的供给效率提高。低下的政府效率会增加企业面临的各类风险(Allen 等,2005)^[40],而政府效率的提升能带来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及更高效的产权保护,降低资源扭曲配置(Rigobon 和 Rodrik,2005^[41];Fabro 和 Aixal,2009^[42]),从而促进企业家创业活动。

本文采用韩永辉等(2017)^[43]、唐任伍和唐天伟(2011)^[44]的政府行政效率指标。在表 5 第(1)~(2)列、第(7)和(10)列的回归中,政府行政效率(*goveff*)在式(2)和式(3)的系数,即系数 δ_1 和 λ_1 均显著,即政府行政效率的中介效应成立,也就是说,反腐败能通过有效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来促进创业活动。由此,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而言,当本地区出现了高级官员被调查的事件,加重了地方反腐败气氛,预示着反腐力度的加大,本地区的政府官员会灵敏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并迅速调整其行为,即形成了一种震慑效应,政府部门和官员认真工作,履行职责,从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表 5 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影响机制检验

被解释变量	<i>goveff</i>		<i>mar</i>		<i>conf</i>	
	(1)	(2)	(3)	(4)	(5)	(6)
<i>anticor</i>	0.023 [*] (1.76)	0.031 ^{**} (2.02)	0.211 ^{***} (3.86)	0.066 [*] (1.70)	0.605 [*] (1.75)	0.564 [*] (1.92)
常数项	5.976 ^{**} (2.55)	6.875 ^{**} (2.05)	-2.159 (-0.23)	-17.480 (-1.30)	240.634 (1.53)	307.740 ^{**} (1.88)
其他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地区虚拟变量	Y	Y	Y	Y	Y	Y
时间虚拟变量	N	Y	N	Y	N	Y
R ²	0.1159	0.1672	0.3464	0.7452	0.2544	0.2681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被解释变量	<i>inc_amount</i>			<i>sto_amount</i>		
	(7)	(8)	(9)	(10)	(11)	(12)
<i>goveff</i>	1.288 [*] (1.74)			1.104 ^{***} (3.03)		
<i>mar</i>		0.331 ^{**} (2.26)			0.145 [*] (1.77)	
<i>conf</i>			0.055 ^{**} (2.39)			0.024 ^{**} (2.42)
<i>anticor</i>	0.529 ^{***} (2.91)	0.548 ^{***} (2.99)	0.539 ^{***} (2.97)	0.090 ^{**} (2.12)	0.116 ^{**} (2.61)	0.112 ^{**} (2.68)
常数项	74.589 ^{**} (2.69)	89.240 ^{***} (2.98)	66.489 ^{**} (2.42)	11.397 (0.72)	21.540 (1.30)	11.405 (0.72)
其他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地区虚拟变量	Y	Y	Y	Y	Y	Y
时间虚拟变量	Y	Y	Y	Y	Y	Y
R ²	0.4104	0.4110	0.4241	0.6606	0.6409	0.6599
N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R² 为拟合优度,N 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其次,观察市场化的中介效应。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不断市场化的过程。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资源更为有效地配置,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仍有手段与空间,通过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影响市场运行,于是形成寻租设租的空间,由此产生腐败。例如,某些在位企业可能对某些政府官员进行行贿,让政府出台偏袒的政策,阻碍新企业进入;又或者某些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利益,故意设租,同样阻碍新企业进入,这些均不利于创业活动。反腐败有助于纠正上述制度偏误,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积极性,有效地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Andreas等,2016)^[45]。

本文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场化程度^①。在表5第(3)~(4)列、第(8)和第(11)列的回归中,市场化指数(*mar*)在式(2)和式(3)的系数,即系数 δ_1 和 λ_1 均显著,即市场化的中介效应成立,也就是,反腐败通过有效提高市场化程度,来促进创业活动。由此,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而言,高官被查形成的震慑效应,不但要求政府部门与官员提高效率,而且进一步规范官员的行为,使其不能逾越自身的权力与职责范围,尤其是不能侵犯市场的边界,损害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从而降低了官员对市场的干预,提高了市场化程度。

最后,考察市场信心的中介效应。反腐败活动的开展有利于解决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完善政治生态环境,有效增强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信心,稳定市场主体的市场预期,充分释放出经济发展信心的红利。外部制度环境越好,对企业家信心的提振效果则越显著,从而刺激企业家开展投资活动和创业活动。

由于在现存的统计资料中难以找到省区层面的市场信心指数^②,我们采用省区的年度增长目标与GDP的比值表征地区的市场信心程度。省区的年度增长目标的收集参考徐现祥和梁剑雄(2017)^[46]的做法,主要来源于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五年规划纲要。一般情况下,省区对本年度的市场发展的信心越大,其年度增长目标越大。表5第(5)~(6)列、第(9)和第(12)列的回归正是呈现了市场信心指数的中介效应结果,市场信心指数(*conf*)^②在式(2)和式(3)的系数,即系数 δ_1 和 λ_1 均显著,即市场信心的中介效应成立,也就是,反腐败通过有效提高市场信心,来促进创业活动。由此,对于市场主体,尤其是创业者而言,高官落马反映出政府及官员寻租设租动机与行为弱化,竞争公平性增强,是营商环境优化的表现。创业者从中增强了市场信心,强化了创业的动力。

六、进一步检验:十八大前后的对比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加大了反腐整治力度,扩大波及范围,“打虎拍蝇猎狐”的高压反腐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从而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不但对政治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也在经济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为考察十八大这一事件的冲击,我们以2013年为时间点,根据上文回归方程(1)式,分样本考察对比十八大召开前和召开后的情况。同样地,被解释变量包括创业企业数增量(*inc_amount*)以及创业企业数存量(*sto_amount*)。表6呈现的是创业企业数增量的结果;表7则呈现的是创业企业数量存量的结果。

表6四列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创业企业数增量(*inc_amount*),第(1)~(2)列的样本期是2000—2012年,第(3)~(4)列则是2013—2016年。四列的反腐败(*anticor*)系数均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无论是十八大前,还是十八大后,反腐败均能显著促进地区创业,这与前文的理论假说一致。再对比十八大前后反腐败(*anticor*)的系数,第(3)列比第(1)列大;第(4)列比第(2)列

^① 采用樊纲指数的1997—2009年版本和2008—2014年版本,两个版本的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以1997—2009年版为基准,对于2009年后的数据,则对照两个版本2008年和2009年的平均差异,按比例转化成1997—2009年版本的数据。

^② 我们也采用了国家层面的市场信心指数,实证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大,即十八大后的系数比十八大前的大,也就是说,就创业企业增量而言,十八大后加大了反腐力度,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十八大前。

表 6 十八大前后对比 I : 创业企业数增量

被解释变量	2000—2012		2013—2016	
	<i>inc_amout</i>	<i>inc_amout</i>	<i>inc_amout</i>	<i>inc_amout</i>
	(1)	(2)	(3)	(4)
<i>anticor</i>	0.546*** (3.08)	0.600*** (3.20)	0.809** (2.21)	0.730** (2.00)
常数项	38.418** (0.016)	46.289** (2.56)	21.408 (0.17)	44.693 (0.32)
其他控制变量	Y	Y	Y	Y
地区虚拟变量	Y	Y	Y	Y
时间虚拟变量	N	Y	N	Y
R ²	0.2926	0.3458	0.1414	0.1681
N	403	403	124	124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R² 为拟合优度,N 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7 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创业企业数存量(*sto_amout*),第(1)~(2)列的样本期是 2000—2012 年,第(3)~(4)列则是 2013—2016 年。同样地,如同表 6 的结果,四列的反腐败(*anticor*)系数均至少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反腐败在十八大前后均能显著促进地区创业,这符合本文的理论假说。再对比十八大前后反腐败(*anticor*)的系数,第(3)列比第(1)列大;第(4)列与第(2)列相当^①,也就是说,就创业企业存量而言,十八大后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大致大于十八大前。

表 7 十八大前后对比 II : 创业企业数存量

被解释变量	2000—2012		2013—2016	
	<i>sto_amout</i>	<i>sto_amout</i>	<i>sto_amout</i>	<i>sto_amout</i>
	(1)	(2)	(3)	(4)
<i>anticor</i>	0.108* (1.85)	0.125** (2.08)	0.138*** (3.30)	0.122*** (3.05)
常数项	-8.551 (-1.16)	1.470 (0.13)	-18.037 (-0.50)	35.709 (0.84)
其他控制变量	Y	Y	Y	Y
地区虚拟变量	Y	Y	Y	Y
时间虚拟变量	N	Y	N	Y
R ²	0.4620	0.5216	0.5681	0.5894
N	403	403	124	124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下显著;R² 为拟合优度,N 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① 在 Chow 检验下,二者没有显著差异。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鼓励大众创业,是中国发展新阶段中促进市场竞争、保持经济活力与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高压反腐是震慑政府官员,营造风清气正社会环境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副省级官员落马表征反腐败行为与强度,基于200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反腐败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冲击效应以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反腐败能显著增加地区创业数量,促进地区创业活动。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地区发生高官落马事件,导致当年新增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增加了5.70万户,约相当于当年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存量数的4.17%。该发现是稳健的,在更换了估计方法以及考虑了潜在共同因素之后,仍然存在。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索了其机制,发现反腐败通过显著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信心三大影响渠道促进创业。具体地,当本地高级官员被调查和处理,加重了地方反腐倡廉气氛,形成了一种震慑效应,促使地方官员更加自觉地按照规则制度履行工作职责,积极提升行政效率和服务效能,减少对市场经营主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和相应的腐败掠夺行为。对市场主体而言,高官落马显示了政治清廉度的提升,营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导向,增强了市场发展的信心,强化了创业的动力。进一步对比十八大前后的差异,发现十八大后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大致大于十八大前。因此,本文衍生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建立反腐败的长效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反腐败促进地区创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促进效应仅在短期显著。一般认为,短期更多的是信息效应,中长期更能反映制度效应。由此,中国反腐的同时应足够重视制度改进,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败的整个过程,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必须驰而不息地“打虎拍蝇猎狐”,让高压反腐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首先,完善反腐宣传机制、监督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建设。积极推进党风廉政教育制度、突出反腐宣传。一方面,提高公职人员自觉性;另一方面,让反腐败深入人心,形成人人有责的格局。加强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及群众监督等,制定监督配套措施,强化反腐办案制度和法律惩处力度。让震慑效应深入到各级政府部门的各公职人员,时刻警惕他们的行为。其次,政府应积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尤其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构建以人为本的干部考核和任命机制,支持干部创新探索,但对腐败一票否决,并追究到底,从源头上杜绝腐败。

第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把握反腐败促进地区创业的影响机制,本文的实证发现反腐败能通过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促进创业。因此,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效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并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行政效率高直接反映了政府工作是否能满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要求,关系到政府的影响力和权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支出是提高行政绩效的重要路径。首先,优化行政机构设置,通过合并设立,合署办公等手段,解决行政机构臃肿、办事流程繁杂、因人设岗等问题,同时完善竞争上岗和淘汰机制建设。其次,改革审批制度,规范政府服务大厅的管理工作,规范行政审批流程。通过“负面清单”等手段,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缓解审批制度给市场公平竞争和投资经营活动的抑制效应,压缩因审批产生的寻租空间,提高市场活力。再次,增强行政公职人员的岗位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主动高效履行职责,提升职业能力素养,不断强化理论学习和提高专业技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完善奖励制度,褒奖表现好的公职人员。最后,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及“互联网+服务”,将实体政府服务、网上平台、移动客户端等结合起来,推进网上申请、网上咨询及网上审批等服务,节约办事时间成本,提高办事效率。

第三,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文的实证也表明,反腐败能通过提

高市场化程度促进创业。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社会及法律等改革密切相关。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化水平,积极推进法制建设,健全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化体系。首先,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及土地等要素市场发展,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要素自由流动及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要素市场服务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水平。完善要素定价机制,减少要素价格扭曲。其次,减少市场分割,消除区域间的市场壁垒,减少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构建公平、竞争和有序的市场环境。再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建设。加强法治建设,明确政府权力,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保护财产权和市场主体的权利,提升市场主体的预期,推进实施诚实守信原则,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公平市场秩序。

第四,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的市场信心。本文的实证也表明,反腐败增强了市场信心,从而促进创业。营商环境的好坏,影响着企业家们创业与投资的信心。优化营商环境,除上述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与深化市场化改革外,要重视企业发展,让企业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首先,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加强企业与政府官员的沟通协调,理清企业与官员的关系,健全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制度,搭建并畅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商平台,积极反馈企业经营发展的诉求,及时解决企业发展的困难,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其次,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缓解市场主体的融资问题,大力扶持创新创业,增强微观企业的活力和市场信心,增强企业获得感。再次,政府应建立科学市场监管体系,推进协同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不因短期政策变化而变化的长期稳定的法治环境。最后,政府要有前瞻性,释放支持创业创新的信号。政府支持“政产学研”的工作,通过抓典型等方法,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

参考文献

- [1]王贤彬,黄亮雄,董一军. 反腐败的投资效应——基于地区与企业双重维度的实证分析[J]. 北京:金融研究,2017,(9): 67-82.
- [2]王贤彬,黄亮雄,徐现祥. 高官落马遏制腐败了吗?——来自震慑效应的解释[J]. 上海:世界经济文汇,2016,(2):1-23.
- [3]王贤彬,王露瑶. 反腐败与经济增长[J]. 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2):61-74.
- [4]高远. 反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经验[J]. 广州:南方经济,2010,(2):15-27.
- [5]王健忠,高明华. 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J]. 北京:经济管理,2017,(6):36-52.
- [6]吴一平,朱江南. 腐败、反腐败和中国县际收入差距[J]. 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2):29-39.
- [7]杨其静,蔡正喆. 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执纪数据的再评估[J]. 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5):84-100.
- [8]周黎安,陶靖.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 北京:经济研究,2009,(1):57-69.
- [9]吴一平,芮萌. 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 北京:管理世界,2010,(11):10-17.
- [10]党力,杨瑞龙,杨继东. 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5,(7):146-160.
- [11]聂辉华,王梦琦. 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2003—2013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J]. 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4):127-140.
- [12]龙小宁,黄小勇. 公平竞争与投资增长[J]. 北京:经济研究,2016,(7):147-157.
- [13]Qian N, Wen J. The Impact of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on Luxury Imports in China[R]. Yal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2015.
- [14]傅勇.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 北京:经济研究,2010,(8):4-15.
- [15]王茂斌,孔东民. 反腐败与中国公司治理优化:一个准自然实验[J]. 北京:金融研究,2016,(8):159-174.
- [16]钟覃琳,陆正飞,袁淳. 反腐败、企业绩效及其渠道效应——基于中共十八大的反腐建设的研究[J]. 北京:金融研究,2016,(9):161-176.
- [17]贺建风,陈茜儒. 腐败与大众创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J]. 西安:当代经济科学,2018,(3):75-85.
- [18]余泳泽,杨晓章,张明. 腐败监督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地区)的经验证据[J]. 西安:人文杂志,2018,(1):37-50.

- [19] Djankov, S., E. Miguel, and Y. Qian, et al. Who Are Russia's Entrepreneurs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5, 3, (2-3): 587-597.
- [20] 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 893-921.
- [21] Hodler, R. Industrial Policy in an Imperfect World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90, (1): 85-93.
- [22] 程俊杰. 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与民营经济发展[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8): 39-54.
- [23] Estrin, S., J. Korosteleva, and T. Mickiewicz. Which Institutions Encourage Entrepreneurial Growth Aspira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 (4): 564-580.
- [24] 陈刚. 管制与创业: 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5, (5): 89-99.
- [25] Dreher, A., and M. Gassebner. Greasing the Wheels?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s and Corruption on Firm Entry [J]. *Public Choice*, 2013, 155, (3-4): 413-432.
- [26] 张龙鹏, 蒋为, 周立群. 行政审批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家才能的视角 [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6, (4): 57-74.
- [27]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nd A. Shleifer, et al.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1999, 15, (1): 222-279.
- [28] Pellegrini, L., R. Gerlagh. Corruption's Effect on Growth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 [J]. *Kyklos*, 2004, 57, (3): 429-456.
- [29] Vorley, T., and N. Williams. Between Petty Corruption and Criminal Extortion: How Entrepreneurs in Bulgaria and Romania Operate within a Devil's Circle [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16, 34, (6): 797-817.
- [30] 赖敏, 余泳泽, 刘大勇, 孟勤国. 制度环境、政府效能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自跨国经验证据 [J]. 天津: 南开经济研究, 2018, (1): 19-33.
- [31] 黄亮雄, 张弛, 王贤彬. 高官落马、政治资源与中国上市企业绩效 [J]. 北京: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 (5): 135-148.
- [32] Rui, B., V. Escária, and P. Madruga. 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Job Creation: The Case of Portugal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 (1): 49-58.
- [33] Li, H., Z. Yang, X. Yao, H. Zhang, and J. Zhang. Entrepreneurship, Private Economy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 (4): 948-961.
- [34] Chang, S., and X. Zhang. Mating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5, (116): 292-309.
- [35] 明秀南. 制度环境、创业与经济增长 [J]. 大连: 财经问题研究, 2016, (4): 11-17.
- [36] Fisman, R., and R. Gatti. Decentralization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Across Countri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3, (3): 325-345.
- [37] 范子英. 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与腐败 [J]. 北京: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 (2): 179-192.
- [38] 温志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J]. 北京: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5): 731-745.
- [39] 隋广军, 黄亮雄, 黄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J]. 广州: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7, (1): 32-43.
- [40] Allen, F., J. Qian, and M.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 (1): 57-116.
- [41] Rigobon, R., and D. Rodrik. Rule of Law, Democracy, Openness and Income: Estimat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s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5, (13): 533-564.
- [42] Fabro, G., and J. Aixelá. Econom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Global and Income-Level Analys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9, 43, (4): 997-1023.
- [43] 韩永辉, 黄亮雄, 王贤彬. 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7, (8): 33-48.
- [44] 唐任伍, 唐天伟. 区域间地方政府运行效率测度: 2000—2009 [J]. 重庆: 改革, 2011, (7): 149-153.
- [45] Andreas, K., E. S. C. Berger, and M. Andrew. The More the Merrier? Economic Freedom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 (4): 1288-1293.
- [46] 徐现祥, 梁剑雄. 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14, (1): 27-40.

Anti-corruption and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HUANG Liang-xiong¹, SUN Xiang-xiang², WANG Xian-bin³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6,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officials affect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to local governments and officials also affect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more vigorously carrying out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ti-corruption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state of Chinese politics. Anti-corruption is both a political and an economic topic.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anti-corruption, it i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tudy the economic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and its underlying influence mechanism. Under the situation of anti-corruption,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s investigated ar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result of the anti-corruption, reflecting the intensity of anti-corruption in the region, which can chang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reg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his study uses high-ranking officials investigated to measure anti-corruption,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anti-corruption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analyzes its important channel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raditional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market environment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high-ranking officials on local micro-economic activities, which is a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theory. We find that the high-ranking official investigated has significant economic effects. It also shows theoretically that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s can produce important information value, which affects the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rs of officials and entrepreneurs. It is an effective reflection of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economy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 unlike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nti-corrup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entrepreneurship, which is a specific behavi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Third,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aim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improving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marketization and market confidence from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subjects.

Based on the 2000 - 2016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by taking the vice-provincial officials sacked to describe the anti corrup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anti-corrup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entrepreneurs. These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by using different estimation methods and considering placebo tests. This study finds that anti-corruption can promote entrepreneurship by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marketization and market confide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mean tha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ability are expected to be the mechanism guarantee of China'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e also examined the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We found that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anti-corruption promoted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more than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we should unswervingly maintain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while fighting corruption in China, we should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We shoul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anti-corrup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legal restraint mechanism. The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institution, change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nd reform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Second, we sh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administration,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and execu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Third, market-oriented reform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nomic, social and legal reforms.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marketization,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and improve the market environment of fair competition. Fourth, build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enhance market confidence of market participants. The empirical study also shows that anti-corruption enhances market confidence and promotes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s entrepreneurs' confidence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vest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their expectations.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high-ranking officials investigated; entrepreneurship; influence mechanism

JEL Classification: D73, L26

DOI: 10.19616/j.cnki.bmj.2019.09.001

(责任编辑:刘建丽)